



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汉学家“德格乐”考述

□周杨* 叶新

摘要 在整理《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续编有关“德格乐”记述的基础上,通过考证还原了“德格乐”的真实身份,即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掌管东方书籍的罗伯特·肯纳威·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作为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道格拉斯出版了《中国的语言与文学》《成吉思汗传》《李鸿章传》等10部汉学相关著作,在《英国传记大辞典》《大英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与中国有关的词条,对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内的中文书籍进行收集与编目,在英国图书馆学、汉学领域以及中英书籍交流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德格乐 张德彝 李鸿章 域外汉学

分类号 G259.1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6.019

晚清外交官张德彝一生8次出国,其中5次到访英国。在他的“述奇”系列中,他经常提到大英博物院中一位名为“德格乐”的英国图书馆员。此人在《走向世界丛书》(含“续编”,下同)中也被王韬(德格乐)、李圭、郭嵩焘(德罗巴斯、德克伦斯、德罗巴、得喀勒斯、得格拉斯、德吉利士)、刘锡鸿(德葛兰士)、曾纪泽(德罗巴)、载振(德诺司)等作者提及,但译名并不统一,括号内即为提及的译名。据张德彝等人的著述,德格乐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主要管理中国书籍,与他们多有往来,交流甚多。按说此人应该是英国一个较为重要的文化学术人物,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检索条件较为原始,《走向世界丛书》的整理作注者们对此人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影响了后人对他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实际上经过40多年的发展,当代学术界特别是汉学界已经多次提及甚至研究此人,只是还没有将彼此紧密关联起来。笔者意图在整理相关域外记述的基础上做一番考证,还原“德格乐”的真实身份,统一相关认识,以昭示其在英国图书馆学界、汉学界的卓越成就以及在中英书籍交流方面的巨大贡献。

1 《走向世界丛书》中的“德格乐”

张德彝(1847—1918),晚清汉军镶黄旗人,系中

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第一批的10名学员之一。他从1866年到1902年间8次出国,留下了出国日记“述奇”系列8种,共约200万字,随笔式记录了他在国外的新奇见闻,弥足珍贵。其中到访英国5次,与此对应的著述依次为:《航海述奇》、《再述奇》(即《欧美环游记》)、《四述奇》(即《随使英俄记》)、《六述奇》(即《参使英国记》)、《八述奇》(即《使英日记》)。值得一提的是,他每次都会与大英博物院中一位名为“德格乐”的图书馆员见面。

笔者以张德彝的有关著述为主,并按时间先后顺序穿插王韬、李圭、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载振等人的相关访英著述,力图对中国人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和德格乐的交集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1.1 1866年张德彝《航海述奇》中的“德格乐”

1866年,不到20岁的张德彝作为同文馆三学生之一,随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遣的斌椿第一次游历欧洲各国。张德彝到英国伦敦的第三天,也即同治五年四月初四日(1866年5月17日),就应邀参观了大英博物院,首先是被称为“集书库”的图书馆,“至集书库,内悉载天下书籍,共八十餘万卷,亦有满、汉、回、番各书。当中玻璃照棚,下有桌椅,国人皆可入内观看,亦可抄录。在北楼遇一英人,姓德

* 通讯作者:周杨,ORCID:0000-0003-0378-8246,邮箱:492884571@qq.com。



名格乐者,能华言,颇清楚,且系京音。其人取许多华书呈阅^{[1](506)}。”

这里提到它的藏书总量为 80 余万卷,其中“满、汉、回、番各书”均是中国书籍。张德彝在这里遇见一位“姓德名格乐”的图书馆员,对方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是北京口音,拿了许多馆藏的中国书籍给他翻看。按张德彝的说法,此人的姓是“德”,名为“格乐”。由于这样的提示过于简单,我们很难将其还原为对应的英文姓名,也就无从得知这位“德格乐”的具体身份,以及他在英国处于何等地位。

“玻璃照棚”这一段指的是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圆形阅览室(Reading Room),建造于 1857 年,是 19 世纪英国的伟大建筑之一。它位于大英博物院的中心,1997 年大英图书馆搬到新馆后,这里成了大英博物院的阅览室。张德彝和王韬等人在下文中也曾提及,因不是本文论述重点,以下不作引用和赘述。

这是目前中国人访问大英博物院乃至其所属图书馆的最早记载。

1.2 1868 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德格乐”

第二位访问大英博物院的中国人是王韬。1867 年底,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请他到英国继续协助翻译“四书五经”,1869 年初两人一起离英回国。1868 年初的一天,王韬也访问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在游记体的《漫游随录》中,他提到:

午后,理君雅各至,同游博物院。院建于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其地袤广数百亩。构屋千楹,高敞巩固,铁作间架,铅代陶瓦,砖石为壁,皆以防火患也。院中藏书最富,所有五大洲舆图、古今历代书籍,不下五十二万部。其地堂室相连,重阁叠架,自巔至址,节节度书,锦帙牙签,鳞次栉比。各国皆按榻架分列,不紊分毫。其司华书者为德格乐,能操华言,曾旅天津五年。其前为广堂,排列几椅,可坐数百人。几上笔墨俱备,四面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去^{[2](101-102)}。

王韬也惊异其藏书之富,提到其藏书为 52 万部,与张德彝提到的 80 余万册不同,应该是统计口径不同所致。王韬也遇到了这位德格乐,提到对方曾旅居天津 5 年,能说中国话。巧合的是,王韬对此人的中文称呼与张德彝的一致。他还进一步提到此人的身份是“司华书者”,即管理中文书籍的图书馆员。

1.3 1868 年张德彝《欧美环游记》中的“德格乐”

1868 年,张德彝第二次到访英国,此次是作为志刚的译员。志刚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为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之一,是清朝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成员,八月初四日到达英国利物浦港。1868 年 12 月 30 日(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志刚无相关日记记载),他第二次到访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但不再称之为“集书院”,而是“卜立地书院”。“卜立地”即“British”的中文音译。“书院”即“图书馆”之意。他说:“有卜立地书院德格乐者,能华语,约明往彼讨论文字。至则呈示华书,与之讲解句法字义,伊颇领悟。后导游各处,见中建大堂,高数丈,四壁存书以万万计,而中华、日本书籍尤多,外有发逆伪军师告示一纸。堂后小屋鳞比,为诸生肄业之所,看毕辞回^{[1](725)}。”

这是张德彝和德格乐第二次见面。据他的叙述,是德格乐请他到馆内讨论中国文字著述。对方拿中文书籍给他看,他就给对方讲解了其中的句法字义,对方很快就领会了。德格乐还领他再次参观了图书馆,其中颇多中国和日本的书籍,还有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发布的一张告示。

1.4 1876 年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中的“扑非色”

李圭于光绪二年(1876)九月廿四日抵英国,十月十一日抵法国游览。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提到“百利替施博物院”(也即大英博物院)时说:

院正中为书库,藏各国古今书七十万册,中华书约万册。……司事衙为扑非色(士子大著名誉,始有此衙),曾充驻华领事帮办者,深服是言^{[2](286-287)}。

他没有点出管理中国书籍之人的姓名,只是说他是“扑非色”,即英文“教授”(Professor)的音译。因为此人“充驻华领事帮办”,应该就是张德彝和王韬提及的德格乐,大学教授似乎是他的另一个身份。

1.5 1877、1878 年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等中的“德克伦斯”等

1877 年,清朝首任驻外公使也是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两国,副公使即刘锡鸿,张德彝是翻译官。三人各自留下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英轺私记》《随使英俄记》中都提到了与德格乐的交往,而且多有交集。

1877 年 2 月 27 日(光绪三年一月十五日),张



德彝先于两位公使拜访了德格乐,这是两人的第三次见面:“午初大雪,乘车往拜万斛、司本萨,及大书院华书长德格乐,亦八九年前旧相识也^{[3](337)}。”他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为“大书院”,德格乐为“华书长”,即馆内中文书籍部门主任。两天后,德格乐就回访了张德彝。

1877年3月23日(光绪三年二月初九日),张德彝随同初访的两位公使再次到访大英博物院,这次是受“家部”(即“内政部”)的正式邀请:

昨接家部来函,请游博物院,英名卜立地石米由自亚木。午初,同马清臣、张听帆诸君,随二星使前往。抵其署,有家部帮办甸伊柏、记室米特佛、威公使、禧在明、有雅梅,暨名儒武阿文等迎候导引。地广数百亩,构屋千楹。铁作间架,铅代陶瓦,砖石为壁,皆防火意也。

先看藏书处:堂室相连,重阁叠架,自颠至址,节节度书,锦帙牙签,各有鳞次,所藏五大洲舆地历代书籍,共七万数千卷,榻架按国分列。其司华书者为德格乐^{[3](360-361)}。

刘锡鸿这一天的日记与张德彝的多有雷同之处,他在《英轺私记》的“播犁地土母席庵”一节中提到“余在京师,即闻英伦有播犁地土母席庵者,大书院也,各国之书必备,到此后急欲一往观之^{[3](111)}。”就中文书籍而言,“观其所赠数册,闺阁之绣谱、店窑之图记,得诸中华者,且纂集以成一编。则其琳琅满目,得毋有择焉而不精乎?是当有以进之^{[3](112)}。”感觉并不见佳。而“所藏有中国经史诸载籍,云是善板。典之者为德葛兰士,能华语亦习华文。日暮人倦,相期异日再观^{[3](113)}。”张德彝记述中的德格乐,在他笔下变成了“德葛兰士”。

而同游的郭嵩焘则称陪同观览“布利来斯妙西阿姆书馆”(即“British Museum Library”的音译加意译)的德格乐为“德罗巴斯”和“德克伦斯”。

过了三天,也就是同年3月26日(光绪三年二月十二日),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到:“德罗巴来见,始询知妙西阿姆掌管汉文书籍,以居中国久,能通汉文故也。现在京师购买《图书集成》,已出价五千金。据梅辉立信,须银八千^{[4](337)}。”这位掌管中文书籍的“德罗巴斯”或“德克伦斯”又变成了“德罗巴”。他告诉郭嵩焘说,他和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汉文正使梅辉立正在商议购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大书,后者来信说需要8000两银子。

1877年6月11日(光绪三年五月初一日),郭嵩焘、刘锡鸿和张德彝又一次应德格乐的邀请来到大英博物院,都留下了日记记载。郭嵩焘提到:

得喀勒斯约重游妙西恩博物院,观所藏中国书籍,兼晤伯尔叱。从外堂左一小门引入,内外两室,上有楼甚小。外室藏印度、日本两处书,内室及楼房亦间藏有日本书。中国书有目录,以廿六字母合音编次之,不分门类。所藏国朝著述为多,杂以小说、时文。所见《通典》、《通志》、《西清古鉴》,皆内廷本。洪适《隶辨》及《隶续》,板亦精雅。阮文达公所刻王复斋《钟鼎款识》,项子京题签,赵子昂书额四隶字绝佳(文敏隶书未经见);古器五十九种,毕良史笺注十五种,秦燬所藏也;一德格天阁亦有数种;徐为刘炎、张诏、洪邃诸家所藏;后跋极多。万历十五年所刻《通志》,略近内廷本而较大,其板稍模糊矣。《御批通鉴》内廷本尤精,外间所未见也。书画卷册,则明永王妃母郑氏辑《古孝经》,仇十洲为图,文衡山分段书之,凡十八幅。又卞润甫山水。又乾隆中《平定台湾全图》。又《圣迹全图》。又日本人虫鸟花草画册极佳。所见佳者止此。内典《教外别传》一书,予求之数年不可得,亦于此见之^{[4](225-226)}。

上次的“德罗巴”又被称作“得喀勒斯”。郭嵩焘一行这次是应邀专门来看馆藏中文书籍,时间较为充裕,看得当然细致。

在刘锡鸿《英轺私记》的“英伦之中国书”一节对这次访问的著述中,郭嵩焘仿佛不存在一般。他对此的有关记述与张德彝的多有相同。

到了1877年12月1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八日),郭嵩焘又记载道:“晚接得格拉斯一信,妙西因管理中国书籍,云新译《元史》一卷^{[4](394)}。”这一次,“得喀勒斯”又变成了“得格拉斯”。对方要告诉他的是刚刚翻译出版了《元史》一卷的喜讯。

德格乐在《伦敦与巴黎日记》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878年10月1日(光绪四年九月初六日),见郭嵩焘这一天的日记记载:

姚彦嘉诣铿心登妙西因,观所新购之《图书集成》。司事德吉利士相为庆幸,以为周地球内第一部大书也。书凡八[六]编:曰天文,曰地理,曰人伦,曰理学,曰经济,曰博物。八[六]编内析为三十二品,又析分为六千部,通一万卷。



此书存琉璃厂积古斋已历数岁,乃为英人购得之^{[4](746)}。

上次的“得格拉斯”又变成了“德吉利士”。他1877年3月26日告诉郭嵩焘,他和梅辉立正策划购买《古今图书集成》,现在它终于出现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中。他誉之为全世界“第一部大书”,可能郭嵩焘在国内都未曾见过。这是英国人的幸运,也是中国人的大不幸。关于此书的购买过程,笔者曾在《〈古今图书集成〉入藏大英博物馆始末》(《文史知识》2019年第7期)作过详述。

1.6 1883、1886年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的“德罗巴”

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著有《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其中也提到了这位郭嵩焘所说的“德吉利士”。其中光绪九年五月廿五日(1883年6月29日)有“德罗巴来,一谈^{[5](642)}。”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二日(1886年4月4日)的记载“至英国书库博物院,与德罗巴谈极久,归^{[5](903)}。”“英国书库博物院”似应为“英国博物院书库”,由于其日记记载甚为简略,我们无从得知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

1.7 1902年载振《英轺日记》中的“德诺司”

1902年6月12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清朝庆亲王载振也访问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他称之为“藏书楼”,“庋藏各国今古图籍三百余万种”。其《英轺日记》这一天的记载甚为详细,我们来看他关于“藏东方书处”的内容:

其藏东方书处,区分中、日为两大部藪。中国典坟虽不备,然通行各本亦十得四五。殿本如《图书集成》《西清古鉴》,皆以西式装成,储于篋。宋元槧本不多见,有宋板中折本《莲花经》数册,有元刻《韩文考异》,明刻大字本《贞观政要》,皆精绝。近复搜求唐人绢本及唐宋人手迹,虽片纸亦珍之。典守者出十数纸以示余,言得自蒙古喀尔喀部,士人掘地得此求售,因购以归。有大历、至正、建中等年号,纸墨残毁,真伪殆难辨矣。……是日导余游观者,为是楼掌东方书籍总理,名德诺司,能操华语,曾为上海英领事。此堂国家岁费仅八百磅。进以地狭,购旁地三十五方里,以被推广云^[6]。

载振提到的《图书集成》即大英博物院1878年买入的《古今图书集成》。而为之导览的是“掌东方书籍总理,名德诺司”。

1.8 1904年张德彝《八述奇》中的“德格乐”

1904年,张德彝最后一次见到英国老友德格乐。他在7月6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记载是:

中初偕内人率孙女乘车西南行二十里,过太木斯江至德威芝村赴德威芝学堂茶会,伦敦博物院东方书籍监督德格乐夫妇代请也^[7]。

这一次德格乐的身份还是“伦敦博物院东方书籍监督”。“德威芝学堂”即德威士学院(Dulwich College),位于伦敦市南郊。

2 “德格乐”身份之考证

在《走向世界丛书》相关游记中,书后编制的“人名索引”对这位“德格乐”均语焉不详。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仅把“德格乐”注明为“英人”。他的《欧美环游记》和《随使英俄记》有“德格乐”,无注释,《八述奇》则无“德格乐”。刘锡鸿的《英轺私记》注明“德葛力士(英汉学家)”^{[3](237)},但正文中却是“德葛兰士”,应该是编校之误。王韬在《漫游随录》的称呼与张德彝相同,不过该书后的人名索引把“德格乐”错成“德格尔”,无注释。另外,曾纪泽的“德罗巴”、载振的“德诺司”均未出现在书后的人名索引中。

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篇幅最多,在每卷的卷尾均有注文,书后索引最为详尽,有137页之多。就“人名索引”而言,光“外国人”索引就有8页。但是德罗巴斯、德克伦斯、德罗巴、得喀勒斯、得格拉斯、德吉利士这六个译名无一列入。

就本文要研究的主题而言,必须首先破解“德格乐”是谁,才能知晓他在英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地位。就上述诸位的记述,我们能得到的信息是: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掌管东方书籍,曾在中国五年,会说中文,翻译过《元史》,购买了《古今图书集成》,有教授身份,晚年掌管德威士学院。经过笔者多方搜索和考证,这些信息都强烈地指向了一个人,即罗伯特·肯纳威·道格拉斯(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以下简称“道格拉斯”)。笔者曾在《〈古今图书集成〉入藏大英博物馆始末》一文中对道格拉斯有所简介,以下展开论述。

道格拉斯去世于1913年5月20日,同年10月出版的《大英皇家亚洲文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即刊登了他的讣闻“罗伯特·肯纳威·道



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大英图书馆杂志》(*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1998年“春季号”(Spring 1998)刊登了“罗伯特·肯纳威·道格拉斯爵士和他的同时代人”(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Contemporaries)。在于英·布朗(Yu-Ying Brown)这篇论文出现之前,国内对道格拉斯几无所知。

综合两文特别是后者的介绍可知,他1838年8月23日出生于德文郡塔拉顿(Talaton)的拉克贝勒大宅(Larkbear House),19岁时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of London)师从著名汉学家苏谋斯(James Summers)学习汉语,第二年被派往中国从事外交事务。在五年时间里,他辗转任职于香港、北京、天津等地的使领馆,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第三助理、驻天津副领事等职。由于他精通汉语,1865年回国后即应苏谋斯之邀,进入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任职达42年之久。1873年接替去日本的苏谋斯,担任伦敦国王学院的汉文教授一职,每周授课两次。1880年,他被提升为馆长助理,主管地图收藏工作。虽然此项工作非他所愿,但是他做了12年之久。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擅长的汉文、日文书籍收藏和编目工作,因为馆内并没有其他专家可以胜任。他参与创建和组织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1873年),他也是在伦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1880年)的主席。1892年,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东方书籍部主任,即载振所说的“掌东方书籍总理”、张德彝所说的“东方书籍监督”。他曾任大英皇家亚洲文会的副会长兼托管人。1903年,他担任了德威士学院院长,同年被册封为爵士。1907年在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任上退休。1913年5月在格洛斯特郡的阿克顿特维尔(Acton Turville)逝世,享年七十五岁^[8]。

3 道格拉斯的学术贡献

由于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长期掌管中文书籍收藏工作,以及长年担任伦敦国王学院汉文教授等,道格拉斯在汉学、图书馆学两个领域以及在中英书籍交流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3.1 汉学领域

上文提到,在1877年12月12日的晚上,郭嵩焘接到道格拉斯的来信,信中谈及“新译《元史》一

卷”。此即他刚刚翻译出版的《成吉思汗传》(*The Life of Jenghiz Khan*)。在前言中,他指明他所编译的原本有三种:一是明朝宋濂(Sung Leen)的《元史》(*Yuan She*,或*The History of the Yuen Dynasty*);二是清朝邵远平(Shaou Yuen-ping)的《元史类编》(*Yuen She Luy Peen*,或*The History of the Yuen Dynasty Classified and Arranged*);三是清朝陈允锡(Chin Yun-Seih)的《史纬》(*She Wei*,或*The Woof of History*)。前言最后的署名机构是伦敦国王学院。

而早在两年前,他在特鲁布纳出版社(Trübner & Co.)出版了《中国的语言与文学》(*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收入了他以伦敦国王学院汉学教授身份在英国皇家学会(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发表的两次演讲:1875年5月的“中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China)、1875年6月的“中国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这是道格拉斯汉学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起点,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以下是他的著作目录:

(1)《中国的语言与文学》,特鲁布纳出版社1875年初版;

(2)《成吉思汗传》,特鲁布纳出版社1877年初版;

(3)《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和绘本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院1877年初版,1903年再版;

(4)《非基督教的宗教体系:儒教与道教》(*Non-Christian Religious Systems: Confucianism and Taousim*),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879年初版;

(5)《中国》(*China*),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1882年初版,1887年、1899年、1900年再版;

(6)《华语鉴》(*A Chinese Manual*),克罗斯比·洛克伍德出版社(Crosby Lockwood and Son)1889年初版,1904年再版;

(7)《中国传奇》(*Chinese Stories*),威廉·布莱克伍德出版社(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893年初版;

(8)《中国社会》(*Society in China*),英尼斯出版社(A.D. Innes & Co.)1894年初版;

(9)《李鸿章传》(*Li Hungchang*),布里斯一桑



兹一佛斯特出版社(Bliss, Sands and Foster)1895年初版;

(10)《欧洲与远东(1506—1912)》(*Europe and the Fast East*, 1506—1912),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4年初版。

这10本著作,既有学术性专著,也有通俗性甚至时事性作品。惟一被翻译成中文的《李鸿章传》就属于后者。该书问世的当年,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第二年他则作为大清国全权特使,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八国之旅,并于当年8月到达英国伦敦并四处参观,曾发出“天下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的感慨。道格拉斯在自序中提到他“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搜集资料,并以此为据,希望在本书中向读者还原李鸿章生活的原貌”。而《李鸿章传》的出版为李鸿章的英伦之行做了很好的铺垫。

蔡尔康、林乐知撰写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即《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记录了这次李鸿章八国之行。在“英轺载笔上”中提到,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1896年8月8日)曾到访了“大博物院”,未曾提到是否到过图书馆和见过道格拉斯。而在随后的“英轺豫论”中则有这样一段记述:“英博物院博士狄鸽垒狮,向慕李中堂之勋业,因而钩稽掌故,排比心得,以西文著中堂年谱,纸贵一时^[9]。”在书后的“人名索引”中,则有“狄鸽垒狮(Douglas, 1838—1913)”,也即道格拉斯。“中堂年谱”即他撰写的《李鸿章》,出版后畅销一时。他还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对李鸿章俄德之行的评论,称赞李鸿章“固一国之老臣,且大臣而又能臣也^{[9](129)}。”

《李鸿章》一书曾两次被我国出版社翻译出版,首先是《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由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策划,李静韬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该书在“出版说明”中指明该书是西方世界第一本关于李鸿章的传记,而且出自晚清在华外交官之手。中国人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记则要到他去世后当年即1901年才由梁启超撰写出版,即《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这本《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而且在于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述及李鸿章的

一生,而是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作者与李鸿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对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所受到的委屈深表同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10]。”

然后是张维军译的《李鸿章传》,2014年6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在“中文版编辑说明”中指明它是向当时的英国读者介绍李鸿章这位国际风云人物的一本书。关于原作者,则承认“我们所知的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道格拉斯还参与撰写了《英国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和《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11年版)中与中国有关的词条,人物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理雅各、儒莲(Stanislas Julien)、玄奘(Hsuan Tsang)、成吉思汗(Jenghiz Khan)、曾国藩(Tseng Kuo-fan)和李鸿章(Li Hung-chang)等,地名如广州(Canton, China)、满洲(Manchuria)、蒙古(Mongols)、北京(Peking)等^[11]。不可否认的是,他是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其汉学成就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肯定。

3.2 图书馆学领域

作为当时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之一,道格拉斯在图书馆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文书籍的收集和编目上。1877年3月,英国哈福德郡的斯蒂芬·奥斯丁出版社(Stephen Austin and Sons of Hertford)出版了*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03年出版了增补版。这部八开大本、多达344页的目录,2010年12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名为《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为此书增加的音序索引、笔画索引、勘误表达149页之多。

这是西方世界编制的第一部大型中文书目,著录了大英博物院收藏的约2万册中国古籍,编纂者即为道格拉斯。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到:

本书目包括的中国图书于不同时间、不同条件逐渐被收藏。图书馆小部分馆藏来自是汉斯·斯隆(Hans Sloane)、哈利父子(Harleian)、旧皇室和兰斯顿(Lansdowne)等遗产。而主要馆藏,一是来自1825年赫尔(John Fowler



Hull)先生所赠;二是1843年,英国皇室将1842年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中国图书赠予图书馆;三是1847年,英国政府把从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先生购买的中文图书赠予图书馆。自那时起,通过购买、获赠等多种方式,大英博物院不断扩大中文藏书规模,现拥有约20000册图书^[12]。

道格拉斯进馆以后,在3种主要馆藏的基础上购买和收集中文书籍,到此书目出版之前已经藏有约两万册之多。该目录中的书籍按作者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编排;如果书名或书中任何地方没有出现作者名,书籍则按书名中的人名或国家进行编排;如果署名中没有出现人名或国家,书籍则按书名主题词或关键字进行编排。另外,该目录还编制了另一套检索系统,可以通过书名检索书籍。

由于中国的作者不仅有自己的姓氏,还有文学上的称谓,有的甚至有谥号,因此道格拉斯在编纂该书目时,尝试为这些作者设定一个统一的称谓,从而减少作者的称谓数,有利于英国学者的研究和读者的阅读。

道格拉斯采用马礼逊主编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的拼字法,原因之一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该拼字法,之二是该拼字法也适合英文读者。

他还提到在该书目的编纂过程中,借鉴了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和理雅各翻译的“四书五经”的前言。

在前言的最后,他还提到斯蒂芬·奥斯特出版社排版时使用了来自上海制造的汉字。

《万国公报》先后两次对于这本中文目录进行了报道。在1878年第477期(1878年2月23日刊行)上刊登的《博物院制成中国各种藏院之书目》提到:

英国博物院中各国各色物件无不齐备,而书中有中国古今各种书籍并有抄本、画图等书,犹有外国人翻译中国之书,俱藏博物院中藏书之所。有人至院,欲看何书,悉于目录中检查,便可翻阅。而各国之书业已定有目录,惟中国书尚未明定目录。兹英国专请一位先生将院中所藏中国各色书名集成目录,刊印成功。嗣后有人往看中国书,便可先行查阅目录,而看欲见之书也。

其中提到大英博物院所藏中文书籍文献没有编定目录,不便检索,因此请一位先生编成目录,予以出版,但未指明这位先生是谁。而在《万国公报》1878年第501号(1878年8月10日刊行)上刊登的《英库华书》中则进一步提到:

中国书籍,已共得三万余种。近有英儒都哥拉斯缮订其目,需纸三百四十四篇,中国书名尽录于其上。各国书名亦尽录于其上。故斯时伦敦城内习华语、读华文极称简便焉。以活字版摆列刷印,由本国京都通行,渐可推暨于遍国中矣。

这里提到编目的是“英儒都哥拉斯”,即是英国学者道格拉斯。结果是“习华语、读华文极称简便”,为学习汉文的英国人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该目录编纂出版时,《古今图书集成》的购买还在筹划之中。上文提到郭嵩焘在1877年3月26日和1878年10月1日的日记中提及了这部大书。前者是说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汉文正使梅辉立从北京给他来信说要出5000两银子(约1500英镑)购买该书,后者则说明道格拉斯庆幸已从北京琉璃厂的积古斋购得该书。这是梅辉立和道格拉斯通力合作的结果。梅辉立在北京寻找卖家和出价,而道格拉斯则努力取得大英博物院托管人的全力支持。1877年11月,这宗中英两国之间最重要的购书交易最终敲定,直到1878年7月才运抵大英博物院。

与中国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目的不同,大英博物院购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西方学者和读者查阅的需要,因此对它进行了必要的包装和编目加工。正如载振的《英轺日记》记载,“殿本如《图书集成》《西清古鉴》,皆以西式装成,储于篋^[13]。”这固然是道格拉斯的功劳。而该图书馆的另一位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则“改订为七百四十五本,洋装巨册^[14]”。1911年,翟林奈又进一步编制出版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An Alphabetical Index to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将条目英译(附中文),按英文字母为序编排。

除此之外,1898年道格拉斯还编纂出版了《大英博物馆馆藏日文刻本和写本目录》(*Catalogue of Japanese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并于1904年推出了增补版。另外,道格拉斯在掌管该馆地图部时也编纂了关于地图的两卷本目录,虽然这并不是他的



兴趣所在,但这是他的职责所系。

以上从《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续编”中的有关“德格乐”的记述出发,还原了道格拉斯的真实身份,历数他在汉学、图书馆学领域的学术贡献以及在中英书籍交流方面的功绩。这只是对这位英国著名汉学家和图书馆学家展开研究的第一步,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和研究这位英国学者。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道格拉斯”注释和索引上的缺陷,并不是《走向世界丛书》(含“续编”)的孤例。依笔者之见,虽然钟叔河先生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整理工作极具开创性,但是由于学界的参与不够,导致整套丛书的人名索引不全,注文过于简略,妨碍学界对相关书籍的进一步解读和研究,这种缺陷一直延续至今。按说出版者应该以2016年“续编”的出版为契机,通盘考虑这套丛书及其“续编”,联合学界力量,参考最新学术成果,借用网络搜索工具,对全部内容特别是索引和注释部分作全面的修订才是。

参考文献

- 1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 I [M]. 长沙:岳麓书社,2008.
- 2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 VI [M]. 长沙:岳麓书社,2008.
- 3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 VII [M]. 长沙:岳麓书社,2008.

- 4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 IV [M]. 长沙:岳麓书社,2008.
- 5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 V [M]. 长沙:岳麓书社,2008: 642,903.
- 6 载振. 英轺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2016:74-75.
- 7 张德彝. 八述奇[M]. 长沙:岳麓书社,2016:482-483.
- 8 Brown Y Y. 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contemporaries [M].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1998, Spring: 122-129.
- 9 蔡尔康,林乐知.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 IX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8:128-129.
- 10 罗伯特·道格拉斯. 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M]. 李静韬,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序二.
- 11 朱冰星. 英国汉学家到格斯《华语鉴》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
- 12 道格拉斯. 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中译前言.
- 13 载振. 英轺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2016:75.
- 14 万国鼎. 古今图书集成考略[J]. 图书馆学季刊,1928(2):235-244.

作者单位:周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叶新,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102600

收稿日期:2022年1月10日

修回日期:2022年3月31日

(责任编辑:支娟)

Study on the Sinologist “Degele” of the British Museum Library

Zhou Yang Ye Xin

Abstract: By sorting out *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 and its sequel about “Degele”, the autho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to restore his true identity, that is,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who is in charge of Oriental books department in the British Museum Library.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nologists in Britain in the 19th century, Douglas published 10 Sinology related works such a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iography of Genghis Khan* and *Biography of Li Hongzhang*, wrote entries related to China in the *Great Dictionary of British Biography* and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nd collected and catalogued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which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academic fields of both Library Science and Sinology circles, as well as book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Keywords: British Museum Library; Degele; Zhang Deyi; Li Hongzhang; Extraterritorial Sinology